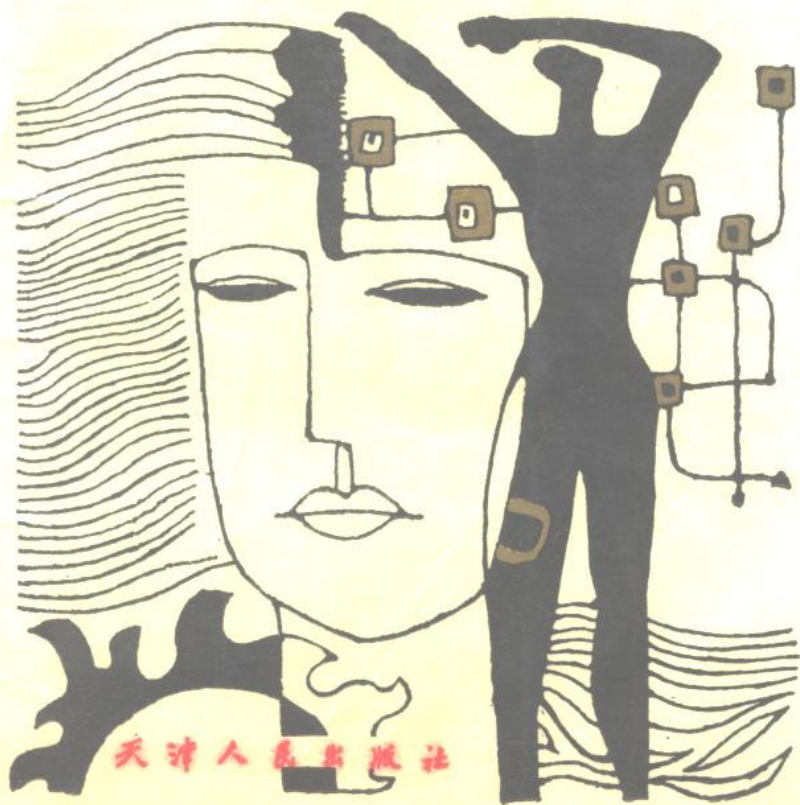


张建伟

——
中国大学毕业生

理性沉思录



天津人民出版社

理性沉思录

——中国大学毕业生

张建伟

天津人民出版社

理性沉思录

——中国大学毕业生

张建伟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8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950

ISBN 7-201-00235-X/D·24

定 价：3.50 元

序：从兴盛到危机（1982——1987）

我永远记得那个三月，1982年的3月。那是我的三月，是在一个叫做中国的国度里，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经历了4年的解冻之后首批毕业，踏上社会所感受到的第一个春波盈盈的三月。

“我毕业了”——所有的感受都凝聚在这简简单单、今天已毫不新奇的四个字中。

那天，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

“张建伟同学，你毕业了。这是你的新闻学学士学位证书。现在，你可以到中国青年报社报到了。”

当时，我道谢了吗？不记得了。我已完全陶醉在即将走上社会的喜悦中。我已经感到全社会向我投来的祝贺的目光。

中国青年报社派车来接我了。是一辆破旧的卡车，把我的书、我的简朴的行李载上去，一路烟尘驶出了校园。那时，大街上还极少见到形形色色的洋卧车，我在破旧的卡车车厢里颠簸着，觉得无比尊贵。

一切都不在话下了，只有三月的美好，三月后的春华秋实激动着我的心。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远古的声音在新时期第一代大

学毕业生身上似乎化做了指日可待的壮志豪情。

世界是我们的，我们的——天之骄子！

从那时起，六年过去了。

1988年的3月——

当我接受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委托、伏案著述这部名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书时，再也没有了六年前的心境，那种可上九天揽月的激情化做了唇边的一丝苦笑和内心不断激荡的理性思考。

又有六届大学生相继毕业了，我们的队伍无比壮大了。然而，激情却没有壮大。不应掩饰，我们应该正视我们自己：我们加深的只是带着困惑的幻灭感。

并非没有成功者。在十万、百万大学毕业生挑选出万八千的成功者并非难事。然而，我见的更多的却是幻灭的泪水——能视而不见吗？

我铺开稿纸，毫不犹疑，在全书的“序”中，写下“从兴盛到危机”的标题。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感要求我必须道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实情，并勉力探寻它的真谛。

危机首先表现为一种充分显像的失落情绪。一位叫黎曙的大学毕业生把这种情绪渲泄了出来：

“近来，我被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罩着，我徒劳地想解脱出来，可悲的是我连这种情绪是怎么回事都说不清楚。索性，还是用我常挂在口头上的两个字——‘没劲’来表述吧。

这使我想起了很早以前看过的一本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是一个太普通的问题，认真地想进去，世上万

物仿佛象一张大网直扣下来，渺小的自我只有在大网之下作着莫名其妙的挣扎和寻找。

但当时我无暇去反省这个问题，我正拥挤在通向一代人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的狭窄天梯之上，——为了老师们呕心沥血的辅导，为了父母亲眼里殷切的光芒，也为了儿时编织过的美丽的梦……我如愿以偿。

现在，我已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在首都的中央机关工作。周围人无不感叹羡慕我的机遇，我的幸运，我的一帆风顺的生活。可我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愉快。在‘春风得意’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精神危机。无论繁忙还是悠闲，内心深处总被一种难以遏制的渴望灼痛着，不得安宁。人们会问：你到底有什么不合意？你还要怎么样？我无言以对，然而这种感觉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滋长着……

我是在改革的序曲中走出校门的，那种‘生逢其时’的感觉曾经使我的一腔热血沸腾起来。我跃跃欲试，想用自己的学识、热情和力量为一个理想、一项事业而全力奋斗。我把‘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名言贴在床头，而且就是伏在这名言之下，奋笔写下了我对本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书。“建议书”递交给了领导，我天天盼望着能有回音。有时偶尔与这位领导走个照面，我便惴惴地迎上去，希望能从他的眼里发现一点点光芒。然而，我的热情与他的冷淡反差太大。几个月过去了，连一句‘我看过了’的话都没有；半年过去了，它大概早被丢在哪个纸篓里了吧。我好长时间都咽不下这口气，我第一次痛苦地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这样的蔑视。我自作多情地看重它，珍惜它，可人家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我向朋友宣泄，朋友见惯不惊地说：‘你太天真了。’

是啊，我太天真了，那么以后再遇到这类事，我就只能用这句话来自我解嘲吗？

我被调去给干部轮训班上课。当我拿起几十年不变的哲学教科书时，顿觉兴味索然。这不象在大学校园里，可以发表‘异端邪说’，侃侃而谈自己的见解。在这里你只能照本宣科。我象一部会说话的机器人，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被分割成条条块块的定理、原理。我的学生们对哲学课毫无兴趣，打哈欠，冲瞌睡，望着窗外发呆。我相信如果不是为了那些文凭或什么考核，他们决不会坐在这间教室里。当我口干舌燥地走出教室时，不由哀叹一声：‘纯粹是浪费生命，真没劲！’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没劲’渐渐成了我的口头禅。这以后的生活更加平淡乏味。从轮训班回来被安排到了办公室，每天的工作不外乎打电话、做记录，通知各类事项，给领导分报纸、文件。即使有些抄抄写写的事也是千篇一律的公文。有时明知是做无用功，却仍不得不做，不得不做得‘带劲’，自己都觉得真虚伪。改革就在身边进行着，我却成了‘多余人’。如同一个‘球迷’，无论怎样为那只足球而神魂颠倒，也没有机会去冲撞争抢。我坚信，只有每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才是社会总体价值的最优化。而那些把我们当成棋子摆来摆去的领导，是否首先把我们看成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独立价值的人呢？

我也曾和本单位的一位大学生相互鼓动说，到领导那里去据理力争一番，要求换个工作。但我们还是克制住了。这样做除了留下一个‘挑三拣四’‘好高骛远’的坏印象，影响今后的使用和提拔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我真为我们大学

时的‘少年意志’感到悲哀。那时我们充满朝气、锋芒毕露，而一到工作岗位却一点不敢乱说乱动，连提出合理要求的勇气都没有。我不知道是社会压抑了我，还是我自己压抑自己。总之我恨自己连一点不满的表现都没有，哪怕能在适当场合向领导发发牢骚也好。其实我们的要求高吗？一点不高。给我们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以表现自己，证明自己。如果在竞争中败退下阵来，那我心甘情愿地去坐办公室，没齿无怨。然而竞争在哪里呢？它虽然叫得满天响，但你伸手去抓时却仍是一场空。

我不知道这种‘没劲’的感觉是不是一种传染病。在一次聚会上，一别几年的‘娇子’们开口闭口就是‘没劲，真没劲！’这使我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好象社会上的人都摆错了位置，都纷纷想跳出自己的单位去另寻新就？人们各自说‘没劲’，却又彼此羡慕。

我们班上的一位才女——中央某大部所属一家报纸的记者，干得正带劲的时候突然被发配去搞校对。原因不是她干得不好，而是干得太好了，老同志有意见，底下议论说：我们做了四年的校对才熬上了记者，她怎么一来就占先？我们的‘才女’愤怒之极，可领导却不紧不慢地说：都是革命工作嘛。看，这个‘革命工作’和那个‘社会需要’何其相似，它们已经成了‘集体潜意识’，谁都愿意用它来教导我们这些‘不安分’的大学生。

我的中学同学——一位理想主义色彩甚浓的热血青年，为了尽快投身改革而放弃了考研究生，可现在也说‘悔不该……’了。他那个厂的计算机房有一台价值昂贵的进口设备没有人会使用，而他又正是学这个的，岂不‘正中下怀’？

谁知领导宁可送几个中老年技术人员去突击学习，让设备闲着，也不让他上手，还谆谆教导他要‘正确对待’，说什么‘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嘛’。我的同学拿着导师的信要求考研究生，领导死活不放，说：‘这些老同志早晚得走，到时候用得着你。’这个‘到时候’大概是十年以后吧。作为一厂之长，产品积压了，他可能会急得团团转；设备积压了，他得想办法让人开起来；可人才呢，越积压得多心里越踏实，越符合他‘战略储备’的信条。我这个同学为考研究生的事弄得筋疲力尽，静下来一想，考上又怎么样，毕业后分到哪个研究所，不还是得窝着！他深知论资排辈也是一种‘集体潜意识’，每个人都反对别人用‘资、辈’来压制他，同时又用自己的‘资、辈’去压制别人。怎么办？出国留学？象很多留学生那样，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后，不说回来也不说不回来。回来吧，空有一身技艺无处施展；不回来吧，难慰一颗报效祖国之心。干脆吊着。他想来想去，最后就下了两个字：没劲！

被称为‘最早投入新生活的勇士’——我们系的学生会主席，辞了职和一帮志同道合者创办了一个公司。惨淡经营了一年多，三分之一的精力是对付上面的多种检查，另三分之一的精力用来应付变来变去的政策，剩下的三分之一陷到了打通关系，磨嘴皮子上。最后，公司跨了，志士仁人们作鸟兽散。如今他辞职丢了‘干部编制’，连个正式工作都找不到。人事部门说那是你自找，我们没办法。当初的一腔热血换来了什么？不顾一切地奋斗一场，价值何在？

我们在大学里接受了太多的思想，以至和社会上实际通行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时产生了剧烈的痛苦。这几乎是难以

填平的沟壑。相当多数的人，甚至包括不少改革者，包括三十多岁的与我们境遇相似但经历不同的人们，都对我们抱有很深的偏见。‘我就是我’的个性呼喊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我们不得不一步步地后退。小时候我们是家庭的宠儿，大一些是社会的‘娇子’，现在发现自己似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曾经那样激烈地抨击中国人的苟安、忍耐，然而我们发现自己也快变成那个‘丑陋的中国人’了。

我们一天一天地丢失着自己，换来一年淡似一年的不甘心。将来的某一天，自己和不甘心都消失时，我们将是谁？

不不，我不甘心。我要弄清楚我们到底要什么？社会能在何种程度上满足我们，我们自身又该付出怎样的努力？”

通篇渲泄的“没劲”情绪的背后，表现出一种在社会中的不适应感和对自我、对社会双重的困惑。

这不是一个人的困惑。文章用的人称“我们”。

如果仅仅是“困惑”，还不足以构成这一代大学毕业生的危机。问题是，“困惑”在行动，不仅仅是“自我”在困惑，“社会”也在困惑，并对“自我的困惑”大为不满。

1986年9月25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发出一篇报道，每个足有一平方厘米大小的黑体字排列出的醒目的标题震荡了整个社会：

怎样看待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
且听中老年知识分子如何评说
十一位企业领导为小字辈画像

画像者分别担任局长、厂长、总工程师、总经理等职，有三位是40年代大学毕业的老知识分子，其余都是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中年知识分子。

他们毫不讳言在“整体”上对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们中国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失望。

他们对这一代大学毕业生的评价是：

——政治上缺乏远大理想。

——为个人着想多，为国家着想少。

——很世故。

——业务上急功近利，轻视实践，惧怕艰苦。

——为事业献身的奋斗精神日趋萎缩，有一种普遍的物质享受思想。

——在个人发展上以“我”的得失为前提，社会责任感淡薄。

——不尊敬工人。

——组织纪律观念差。

一位厂长还打了这样的比喻：“大家都看了《阿信》。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有些象阿信，他们有点象阿仁。”

这真是一幅冷酷的画像，快笔如刀，毫不留情。中国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们，还是第一次这样被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他们耐不住这样的“严寒”。短短几天之内，他们的抗议信、申辩书、指责信雪片般朝中国青年报社飞去。编发这篇报道的部主任李大同后来对我说：“我们不得不再发一篇报道，以示我们的不偏不倚。”

报道用同样的字号标出题目，以示公正：

当代知识分子素质究竟如何

一批青年袒露襟怀直陈心曲

请看小字辈自画像

“自画像”对上篇报道中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持有不同意见：

——很多企业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用武之地。他们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不是萎缩，而是向各个不同方面发展。

——没有用武之地又如何献身，如何奋发有为呢？

——人才流动是好事，为什么却受到指责？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富有政治理想，大多数都要求进步，只不过表现形式与过去不同，希望各级领导多具慧眼。

——不是青年缺乏远大政治理想，而是两代人对政治、理想、信仰的理解不同。

两篇针锋相对的“客观报道”引起了两代知识分子持续三个月的对话。对话在1986年12月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时结束，没有结论。但一个事实被再次肯定：中国大学毕业生确实处于危机状态。

不幸的是，危机仍在深化，并以大学毕业生们最为心寒的形式表现出来。

1987年夏，京、津、沪等大城市，甚至许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受到社会的冷落，各市都有数百名大学毕业生无人问津，数千人分到单位后竟被用人单位退回。在极度稀缺人才的中国，居然出现人才“滞销”的局面，昔日天之骄子竟找不到“婆家”，成为社会弃子！

中国大学毕业生又增添了一重新的危机。这种危机也影响了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使他们昔日对社会的信赖感变成了

恐惧感。

南开大学杨卫红在《得意的失落》的标题下，忐忑不安地写出如下的心里话：

✓ “小学、中学、大学。我们一帆风顺，拥有了大学的文凭，却依旧无知。这无知，是对社会的复杂、人生的艰辛、奋斗的困苦等等一切的茫然。难怪我们有痛苦，有迷惘，有寂寞，有惆怅。

昨天收到两封信，一封是毛健刚来的，他刚毕业分配在省统计局，另一封是湘潭大学李琼写的。两封信都写得伤感而怅然。我读后也伤感而怅然。青春的迷惘？青春的思考？青春的痛苦？青春的……？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这两封信所表达的心情（这其实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心理）。两封信都流露出害怕走向社会，对曾经热烈渴望的社会生活非常迷惘的心情。我的心也戚戚焉，我们害怕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害怕被社会淘汰，尽管现行的体制并未完善到使一个拥有重点大学文凭的大学生失业的地步。

✓ 在别人的眼里，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胸前拥有一枚令人羡慕的重点大学的校徽。我们也曾为之喜形于色。然而现在我却越来越清楚地觉得，胸前的校徽，显示的不仅仅是幸运，这里面也潜藏着我们深深的不幸。这是许多人所无法体会、无法理解的。大学的校门始终敞开着。我们的双脚却鲜有机会迈出这扇大门。我们对校门外的世界了解得太少太少，简直是茫然无知。当我们走上社会，我们面临的便是一个陌生的、难以适应的环境。

自从戴上大学校徽，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提高了，我们的

自我期望值也提高了。校徽，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使命，我们深深地懂得自己这一代人的使命，更清楚作为一个大学生所应有的责任感。我们不想让自己失望，更不愿让社会失望。我们躁动不安地寻求自我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完成社会对我们的期望，实现生命的价值，让生命的轨迹闪光。

然而，我们知道，要让生命的轨迹闪光是会很难很难的，这不仅仅在于我们缺乏社会经验，而且还在于我们至今还被分数牵着鼻子走。在大学里，分数意味着名誉，意味着在老师、同学心目中的地位，意味着能不能得奖学金，能不能分配到一个好的工作。因此，我们还得拼命地要高分，为了得高分，我们还得和中学生一样，天天去背课本、背笔记，背一条条名词解释、一个个哲学问答……

我曾为自己得到一次又一次的高分而自鸣得意，而今这种得意已经彻底地失落。走上社会，分数将一钱不值！我拥有大学的学历，但学历不一定能成为‘武器’，我缺少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在社会生活中与困难搏斗与战胜困难的经历。没有这一‘杀手铜’，在走上社会之后，我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强者吗？”

1987年岁末和1988年初掀起的震荡了整个中国的“海南狂潮”绝非一个偶然现象。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万名大学毕业生直奔海南孤岛，构成了改革时代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对此，众说纷纭，数百名记者也云集海南，试图对这现象做出历史的深层透视。然而，做结论还为时过早，已被诉诸报端的通讯所揭示的还仅仅是一种表象。只有一点是现在即可肯定的：在这红红火火的海南人才冲击波现象背后，已透露

出社会（包括体制、文化、人才观念）和大学毕业生们所互难相容的双重危机。

“序言”写到这里，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忧虑：我这样强调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危机能被人们所容忍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种很难逆转的思路方式沉积了下来：一提起“危机”，便仿佛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同危机相伴生的，是一种绝望感，而不是摆脱危机的希望感。

这种思维方式应该走进历史的博物馆了。

整个世界都充满着危机，但世界并未因此而毁灭。

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无法面对充满危机的世界的。

危机，它是突破困境的临界点。

危机的本质是重新审视世界，重新审视自我。

只有危机才使挑战成为必要，积极的指向进取的危机感是黎明前的暗夜充满希望与新生的蠕动，只有它，才有资格拥抱那从海中跳出的热滚滚的太阳。

这就是本书的“立意”。

作 者

1988年5月

DZ-B9 114

目 录

序：从兴盛到危机

(1982~1987)

上篇：困惑

——危机中的自我审视

第一章 准备的与毫无准备的·····	(3)
第一节 褪色的画·····	(3)
第二节 五个案例·····	(8)
第三节 反馈追溯·····	(18)
A. 理解错了的自我实现·····	(20)
B. 指责错了的个人奋斗·····	(27)
C. 培养错了的低能儿·····	(41)
第四节 对话：中国教育的危机·····	(53)
小结：学会生存·····	(57)
第二章 期待的与被期待的·····	(60)
模糊的前景（我们朝哪里去）·····	(60)
第一节 自我期待与社会期待——二律背反·····	(61)
第二节 知识本位与伦理本位——两种逻辑·····	(68)

第三节	合理的不合理与不合理的合理——马太效应·····	(75)
第四节	接受性文化与选择性文化——两种冲突·····	(86)
第五节	顺境与逆境——两种视角·····	(97)
小 结	社会文化——全方位的理性审视, 兼论“怀才不遇”与“怀才误身”·····	(107)
第三章	超越的与不能超越的·····	(110)
	“城堡效应”·····	(110)
第一节	未能超越·····	(111)
	命运备忘录·····	(111)
	MBA: 中国的呼唤·····	(112)
	MBA: 命运之剑·····	(113)
	MBA: SOS·····	(127)
第二节	试图超越·····	(129)
	海南狂潮记事·····	(129)
	蝉蜕的翅膀·····	(137)
	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	(145)
第三节	不可超越·····	(147)
	体制, 存在即合理·····	(147)
	小结: 呼唤体制的重建·····	(149)

下篇: 追求

——选择中的自我实现

开篇的话	成才方程式没有唯一的解·····	(153)
第一章	适应与创造·····	(155)